

三聯精選・6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

——二十世紀神學引論

劉小楓著

三聯精選・6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

——二十世紀神學引論

劉小楓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三聯精選

策劃：董秀玉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

責任編輯：林道羣

裝幀設計：阿 奇

書 名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二十世紀神學引論

(三聯精選・6)

作 者 劉小楓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十號12樓

版 次 1990年11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140×203mm)484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852・7

© 1990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獻給我們這一代

**N'y a-t-il point une vérité substantielle,
voyant tant de choses vraies qui ne sont point la vérité même?**

—— Blaise Pascal ——

**鑒於有這麼多的東西全都不是真理本身，
是不是根本就沒有一個實實在在的真理了呢？**

—— 帕斯卡爾 ——

前言

1988年初秋至1989年初春，我在《讀書》月刊主編沈昌文、董秀玉先生和編輯部主任楊麗華女士的熱情支持下，以“默默”筆名在該雜誌上發表了十篇評價現當代神學的短文。本想就此罷筆，轉入別的研究計劃。但沈、董先生和楊女士堅持主張應結集成書，並一再轉來讀者來信，稱這亦是讀者的要求。

如果只是把已刊出的十篇蒐集成書，那就太有負讀者們的厚望了。本書不僅將原有的十篇作了略微調整和較大的擴充，而且還新增補了三篇。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不是二十世紀基督教思想史——我無意做這種史論研究，也不是現代著名神學家評傳。我既未勾勒現當代神學思想史的發展綫條，也未收羅本世紀全部重要的神學家，甚至也沒有對所涉及的神學家的思想作全面評述。我只注目於一個問題：十字架上的真理與我們的存在、我們的境遇和我們的文化之關係及其在存在論上的相遇。

此世的真理多矣：科學的真理、哲學的真理、歷史的真理、“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社會真理。這些真理我們已領略甚多，但它們都是人構造的真理。十字架上的真理不是人構造的真理，而是上帝在愛的苦弱和受難中啓示給我們的真理。我們可以在這種啓示中存在，並見證這種真理。本書所涉及的人物及其思想，都是本世紀對上帝

存在的活的見證。關於十字架上的真理，由於種種歷史原因，我們已隔絕音訊甚久，以至於我們中的許多人以為它已然從此世絕迹。本書想提醒我們中的許多人，十字架上的真理仍然是照射着此世的強光。

十字架上的真理是活的真理、關懷每一個人的存在與非存在的真理，對於這種真理，需要人們從自身的存在和境遇出發去聆聽和踐行。因此，本書的討論大都結合我們面臨着的存在論上的問題，儘管它採用了純粹理論的科學的形式。更明確地講，本書並不提供對本世紀傑出的神學家的思想的全面分析評述，毋寧說，它僅呈現為作者感受到的受歷史和文化規定的存在論問題與神學問題的相遇，進而力圖與神學家們共同思考。作者希望，本書能激發更多的人在這一定向上作進一步的思考，故此名曰“引論”。

自我五年前全力轉入基督教神學研究以來，國內的友人大都迷惑不解。有的朋友甚至以為我誤入歧途，還有的人則以為我想用基督教來救中國。

對於所謂“誤入歧途”的關心，我無需多說。《拯救與逍遙》已給予了充分的明確回答。至於所謂“救國論”，我想在此申明：我從來沒有說過要用基督教來救中國，也從不曾有此念頭。這種認為我要用基督教來救中國的論調是非常荒唐的。我哪能救國呢？區區一介書生，豈有救國之能力？又曾何敢有救國之妄想？我只想過何以救自己。再有，基督教能救國麼？它救國麼？否！耶穌基督只救人救世。況且，中國需要一種什麼“教”去救嗎？誰不知道任何“教”都不能救中國？！把我們自己或中國從“救國論”的話語中救出來，大概才是一件切實需做的事。

我從美學、心理學、哲學轉向神學，首先是出於個人之信念，隨之是學術之意向，然後是文化之定向。對於個人之信念轉向，我

無需在此陳述。關於學術之意向和文化之定向，不妨略予說明。

神學——當然就基督教神學而言，是一門有悠久歷史和自身傳統的科學（Wissenschaft，不是Science），而且是最高的科學。在西方的大學裏，神學至今仍是一門訓練嚴格、對人文知識素養要求甚高、需花苦功才能學好的學科。沒有哲學、古典語言和歷史、思想史的相當基礎，根本唸不好神學。在西方，神學研究有悠久的傳統和豐厚的基礎，這一學科在歐美至今仍具生命活力，傑出的學者不斷湧現，神學研究成果汗牛充棟。獻身神學研修的青年從不乏人。僅聯邦德國圖賓根大學神學系目前就有三千多學生在讀。

按照最一般的規定，神學是研討上帝的自我陳述，是深究上帝的話。作為一門科學——非常獨特的科學，神學在我國的文化學術傳統中一直闕如。但它應該而且能夠作為一門人文科學中的最高學科在我們的文化學術領域中建立起來。作為一個學者，我選擇神學的定向，不是十分自然的事嗎？至少我有選擇如此學術定向的個人自由。

卡爾·巴特臨逝前，在巴塞爾大學神學系的一位博士生的學位論文上題辭道：“在所有科學之中，神學（Theologie）是最美的科學，它最能觸動和豐富人的心靈和大腦，最貼近人之確實性，最明澈地探望一切科學最終要詢問的真理。但在所有科學中，神學也是最艱難、最需小心審慎的科學，這門科學最杜絕望而却步和狂妄自負。”對一位學者來說，如此科學還不够富有魅力嗎？

中國傳統文化學術一直缺少這門最美又最難的科學乃是一大不幸。如今，我們這一代或以後幾代學者都面臨中國文化學術之重建的任務。基礎神學研究是必補的一門學科。文化重建不是靠單純的主張，而是靠行。難道這不可能嗎？難道神學是我們的文化學術的異質或外來學科嗎？神學同樣是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學科，因為它

是屬人和屬文化的學科，而非屬於西方的學科。

至於神學與我們的存在真實和現實生活的內在關聯這一最根本的問題，我無需在此贅述。本書中已作了充分的討論。我只想補充卡爾·巴特的話，神學不僅是最美、最艱難的科學，更是與每一個人的實存本身的問題貼合最緊的科學，是關於人之成人的科學。

本書主要討論了本世紀最重要的幾位天主教和新教神學家的思想。之所以選擇這些而非別的重要神學家，完全是作者帶着自己的問題去選擇的緣故。因此，各章之編排順序，不是編年性的，但亦絕非是隨意性的。此外，本書基本上沒有涉及俄國東正教的現代思想，這並非因為其不重要，也並非因為其現代乏人。相反，俄國現代基督教思想是作者情之獨鍾所在，有一大批思想家值得相會。作者因已另擬就專門的研究計劃，故此書暫付闕如。

自我從學神學以來，步履艱難。圖書奇缺，完全靠獨自摸索，無師可求。幸而近年來得到海外學術界的許多同輩和前輩學者的熱情鼓勵和關懷，從學術圖書到個人生活方面，都給予了殷切的扶助。諸多溫誠友愛，令我終生感懷。在此，我對林道羣先生、瑪莎女士、聶應輝先生、童小軍先生、程雪貞小姐、梁燕城教授、房志榮教授、項退結教授、李景雄博士、李志剛博士、華澄濤博士、戴智民博士（Dr. Richard Deutsch）、奧特教授（Prof. Dr. Heinrich Ott）、漢斯·昆教授（Prof. Dr. Hans Küng）和莫爾特曼教授（Prof. Dr. Jürgen Moltmann）表達我衷心的感謝。我還要感謝舒伯特博士（Pfar. Dr. Theophil Schubert）和阿波蘿麗女士（Frau Lea Apolloni）為我在巴塞爾大學神學系研修系統神學所提供的諸多幫助。

作 者

1989年10月2日於深圳大學海月樓寓所

目 錄

i 前言

- 1 從絕望哲學到聖經哲學
- 41 上帝就是上帝
- 73 人是祈禱的X
- 101 神聖的相遇
- 130 分擔上帝的痛苦
- 162 信仰的重負與上帝之愛
- 210 不抱幻想，也不絕望
- 255 期待上帝的思
- 291 傾聽與奧秘
- 325 十字架上的普世挑戰
- 375 十字架上的榮耀之美
- 416 十字架上的未來是大地的希望

從絕望哲學到聖經哲學

俄國作家安德列耶夫有一篇非常著名的作品《牆》，它用象徵主義的手法描寫“我和另外一個麻風病人”在黑沉沉的夜的大地上爬，想找到大地和上天的分界綫在哪裏。然而，一堵下臨深淵，上抵高山的牆擋住了他們，把天空和大地一截兩半。他們“拼命用自己的胸膛去衝撞這堵牆，傷口滴出的鮮血把這堵牆染得通紅，但牆却依然靜靜地聳立着，巍然不動”。於是，人與牆的搏鬥開始了，這個“我和另一麻風病人”沒有時間，既無今天，也無昨天和明天，只有黑沉沉的夜，這夜却“把黑洞洞的無底深淵、傲慢地巍然不動的牆以及一小撮顫顫栗栗的可憐人照得通亮”。有的人“把牆視作朋友，緊緊地貼到它身上，把它當作靠山，求它保護自己；可是這牆却一直是我們的仇敵。一直是”。在這裏，發生了一系列恐怖的不幸，有哭泣、有鮮血、有憤怒、有詛咒、也有歡樂和愛情。然而，“我和另一個麻風病人”與牆的搏鬥是無望的，這個“我”只能說：“我們人很多，我們的生活都不堪忍受。就讓我們用屍體鋪遍大地吧。”他們同其他在牆根下的人一起，每隔一定的時間就用前額撞一次牆，他們感到，自己雖然每隔一秒鐘都在漸漸死去，但自

己“是永生的，恰如上帝一樣”。①

安德列耶夫筆下的牆象徵什麼，此不考究。我要指出的是，這個象徵故事本身恰好可以視為某一些人追尋真理的寫照。對這些人來說，真理應是活的真理，即關涉每一個體的生與死的真理，而非外在於本已生命的為他的真理。在這個世界上，被視為真理的東西何止一二，然而，真正關涉到人的本己的、不可轉讓的生死的真理，却只有一個。這種真理本身就是由一次獨一無二的生死事件顯示出來的。對於置身於自然性、必然性和規律性的，命定之中的存在者——人來說，接近如此真理的道路，是伴隨着哭泣、憤怒、悲哀、詛咒和歡樂與愛情的道路，是用流血的頭撞一切必然性的鐵牆的道路。

1938年11月20日清晨，俄羅斯著名哲人、基督教思想家、文學批評家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在巴黎的一家醫院病逝，結束了他流亡異國十八年的漂泊生涯。在這一年裏，他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著作《雅典與耶路撒冷》（*Athens and Jerusalem*）用俄文在巴黎出版，在書中，他同聖經中的使徒一起發出了喜悅的歡呼：“死亡，你的毒刺在哪裏？地獄，你的勝利在哪裏？”舍斯托夫與賜予人永生的真理同在。

作為哲學家、文學批評家，舍斯托夫竟然與聖經中的使徒為伍，同他們一起發出這樣的歡呼，的確讓人感到奇怪。哲學、文學批評與先知和使徒們有何相干？後者關注的是死亡的地獄，及其與上帝的關係，前者關注的是邏輯、普遍法則、語言結構、再現與表現的形式，難道兩者竟有相通之處？的確，作為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的舍斯托夫，一生都在破壞哲學和文學批評的傳統習慣。

畢竟，舍斯托夫的“學術”生涯是從他的處女作《莎士比亞及其批評家勃蘭兌斯》（*Shakespeare and His Critic Brandes*，

1898)開始的，他以後的一系列文學批評著作與這部處女作一樣，首要關注的是死亡、地獄、生活中的悲劇性深淵與真理的關係問題和究竟何為確實的真理的問題。自近代以來，哲學家、科學家乃至文學家在這些問題上否棄聖經中的先知和使徒的立場，將它們判為謊言，並根據自身的立場來構造出關於存在與非存在的真理。然而，活的真理只有一個，聖經中的先知和使徒與哲學家、科學思想家就活的真理問題發生的爭辯，總有一方是把謬言當作了活的真理。

舍斯托夫宣稱：害怕活的真理是人最突出的特徵之一，口頭上熱情捍衛真理的人，實際上最害怕活的真理。言下之意，哲學和科學頌揚的恰是謊言，而不是活的真理，它們以論斷真理的方式撒謊。可是，我們當然不能未加考察就聽信舍斯托夫的見解，說不定撒謊恰是他與之為伍的先知和使徒們幹的；起碼，數百年來，哲學和科學就是這樣認為的。

究竟誰在撒謊，這一問題恐怕長期難以澄清。但無論如何，在這個哲學和科學以日新月異來標誌自己的勝利的時代，我們仍然有必要聽聽舍斯托夫是怎麼說的，他告訴了我們些什麼；對於那些因真理與謊言的混淆而困惑的人，認識他肯定沒有壞處。

二

要認識舍斯托夫，首先得大致了解一下俄羅斯精神。

俄羅斯精神獨特的深沉、虔敬、博愛、崇敬苦難的素質，早已使我們這一代人感佩不已。這種精神素質乃是由文化諸形態鮮明、突出地體現出來的。換言之，正是文化諸形態（哲學、宗教、藝術、生活態度——我們可以從小說中得知）使這種精神素質具有了確定形式。對俄羅斯精神的認識，從文化形態入手，恐怕是最得當的門徑。

衆所周知，自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化在世界文化形態中顯得異常突出，爲世界文化貢獻出一大批文化精品。尤其在近代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形過程中，俄羅斯文化舉足輕重。然而一種民族文化精神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趨於成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羅斯的文化精神運動來臨之前，俄羅斯精神早已在俄羅斯大地深深地植下了根。公元九世紀，俄國基輔女大公爵奧爾茄接受了基督信仰，隨後，俄國接納了以君士坦丁堡爲中心的希臘東方正教。中世紀末期，君士坦丁堡淪入回教徒之手後，俄國教會便挺身捍衛東方基督教的真理，主動負起保存基督真傳的責任，繼續與西方基督教分庭抗禮，堅持宗教熱情的首要性，反對西方教會偏重理性，以致於發展出一種所謂的俄羅斯的彌賽亞主義。因此，俄羅斯精神的首要特質是基督宗教性，換言之，俄羅斯精神的本質乃是東方基督教思想與俄羅斯民族的天性結合的產物：這種精神的基本定向是尋找上帝，趨向於上帝的神秘。俄羅斯精神始終把追尋上帝、拯救、不朽視爲永恒的問題。俄羅斯民族與基督教的關係，已然有力地反駁了宗教必須土生土長、否則就沒有生命力的論調。

但是，所有接納基督宗教浸潤的民族，都會把追尋上帝的神秘和拯救作爲自己的首要意向。因此，俄羅斯精神的宗教性質肯定還有別的獨特之處。

著名俄國社會學家Hecker是這樣來談論俄羅斯的宗教性格的：俄羅斯精神通過受苦受難的意識接近上帝，在俄羅斯人眼裏，基督是受難的基督，是受難的象徵，“Without a Cross—without a Christ”（沒有十字架，就沒有基督）。②

極端強調基督的受難形象表明，俄羅斯精神的神性意向以受難意識爲基礎；通向上帝的道路，是受苦受難的道路，而且不可能有別的道路。記住這一點是必要的，否則，當我們以後看到舍斯托夫

爲苦役哲學、絕望哲學大唱讚歌，宣稱通向活的真理的唯一路徑就是苦役，勢必會感到不可思議，進而視之爲奇談怪論。

由於受難基督的形象的特殊地位，由於受難意識的深切，在俄羅斯精神中，所謂的宗教虔敬感就有了獨特的含義。Hecker指出，在俄羅斯，虔敬（Piety）就意味着十字架，意味着悲哀，意味着肉體的受苦和死亡。俄羅斯精神的宗教素質就以這種虔敬感（sense of piety）爲基質，它與悲憐感（sense of pity）^③、羞澀感（sense of shame）一起，共同構成了俄羅斯魂的主要特徵，Hecker把它稱之爲Russian idea（俄羅斯的理念）。

與其他西方民族一樣，俄羅斯魂向來熱愛、渴慕和追求真理。但在俄羅斯精神那裏，真理只是神性的真量，它與上帝一致。“Who seeks the truth is sought of God”。應當注意的是，這裏的真理的含義，並沒有希臘理性主義的理念論色彩，所謂神性的真理或真理與上帝的一致，並沒有近代理性主義的形而上學真理的內涵。

俄羅斯精神的另一個重要特質是厚重的道德感。這種道德感不是來自於基督教的道德教誨，而是來自於俄羅斯民族的道德傳統。不過，俄羅斯民族的道德傳統並不與基督宗教相牴牾，更不以道德來取代宗教或把道德置於宗教之上。宗教感才是更爲根本性的，也是道德感無法取代的。在俄羅斯精神中，虔誠就完全不與道德準則相涉。這裏必須注意的是，一方面，作爲一個有深厚道德傳統的民族，俄羅斯人堅持生活態度的德性，另一方面，俄羅斯精神又堅持宗教感的絕對至上性，因而也就規定了道德力量的限度。這種限度意味着，人與世界中的許多困難不是人間的道德法則能予解決的，如果把道德視爲普遍的、絕對的至高法則，以致於取代宗教，就會出現價值的顛倒。當托爾斯泰迫於內心的矛盾，宣揚“至善即上帝”時，舍斯托夫馬上指出，這與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是同一個意思。

西方近代理性——科學精神發端於西歐（英、法），隨後由西向東漸近。這時，新興的科學理性精神必然要與古老的神性精神發生碰撞。有的時候，這種碰撞會產生奇異的效果。德國古典文化就是一個例證。在十八世紀以前，在德國，除了宗教思想外，沒有出現什麼重要的思想家。然而，繼萊布尼茨之後，尤其是在十八世紀下半葉——十九世紀上半葉，德國湧現出了一大批超絕塵響的文化精英，哲學、宗教、文學、藝術以及人文科學諸領域呈現出異常的繁榮，德國文化從此進入世界文化的高層。在十九世紀初，沉寂的、然而又具有古老的神性傳統的俄羅斯文化也向“西來文化”敞開了大門，新興的科學理性文化蜂湧而入。隨後是一場文化的混戰，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場偉大的精神文化運動來臨了。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羅斯出現的這場偉大的精神運動，在諸多方面都與德國的古典文化運動相似：各種新興的、令人振奮的文化思想自西湧入，當時的俄羅斯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歐的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掌握西方語言也成為學者文人的必修功課；與此同時，許多新的思想在這場文化的碰撞中萌發了，各種流派應運而生。這種“百家爭鳴”的文化運動，成了近代文化形態向現代文化形態過渡的轉折點，成了現代文化的催生地。與德國古典文化運動一樣，這場俄羅斯的精神文化運動首先在文學、藝術領域發端，小說、詩歌、音樂、繪畫引頸長鳴，俄羅斯魂開始向世界發言了。隨之而來的是哲學、宗教及人文科學諸領域的精神飛躍，以致於到了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文化已結出了許多豐碩果實：文學上的象徵主義、語言學中的形式主義、社會學④、心理學、性哲學等現代文化形態佔據了文化的舞台。

俄羅斯的這場文化精神運動使俄羅斯魂向世界文化敞開了心扉。這場文化精神運動產生的社會機制，顯然十分複雜，無疑是社

會學的有趣課題之一。僅從文化形態來看，大概下列兩個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俄羅斯民族本身具有豐厚的宗教——道德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充分汲取近代西歐新興文化的營養。然而，更為根本的是，歐洲近代文化中隱伏着的致命困難，被俄羅斯魂捕捉到了，由此才會有文化的轉形自然出現。

新老文化的交溶，必然會引起一場精神和價值信念上的混亂。文化上的繁榮與混亂，在某些場合就是同義語。德國的古典文化時期和俄羅斯的精神文化運動時期，情形正是如此。1905年出現的以伊萬諾夫（Vyacheslav Ivanov）為首的“精神無政府主義”（Spiritual anarchy）小組，就是一個具體的寫照。

但是，與德國古典文化不同，面對精神和價值信念的重構，俄羅斯魂並不是給出一大堆形而上學的思想體系，而是極大地具體推進了基督宗教的思想。虛無主義就是俄羅斯人首先站出來與之抗爭。當虛無主義尚未像瘟疫一樣在世界蔓延，俄羅斯人就開始反駁它，並與之作殊死的搏鬥。俄羅斯的基督宗教思想在這場鬥爭中得到輝煌的展現：這是一種道德和宗教上的虛無主義，在精神的改塑、文化的轉形和價值信念的重構時代，它把自己裝扮成新的真理的追尋者，以不能說是虛偽的激情向人們提供種種實質上是虛無主義的價值觀念，並且在知識分子階層廣為蔓延。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憤怒地問道：“屠格涅夫，赫爾岑，烏京，車爾尼雪夫斯基之流又給我們提供了什麼呢？不是偉大的上帝的美，而是對它褻瀆，他們全都那樣惡劣地貪圖虛榮，不知羞耻地容易激動，輕率地傲慢不遜，簡直難以理解：他們指望什麼，誰會跟他們走？”^⑤

俄國宗教思想家們認為，虛無主義是西方基督教理性化的後果，因此，必須反對理性形而上學，以整個生命存在去體悟神性的真理。舍斯托夫的思想正是在當時的一場反抗虛無主義的鬥爭的背景下出